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7.1.001

王湘穗：“币缘政治的历史与未来”，《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期，第1-15页。

WANG Xiangsui, “The Evolution of Currency-politics”, *Pacific Journal*, Vol.25, No.1, 2017, pp.1-15.

# 币缘政治的历史与未来

王湘穗<sup>1</sup>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191)

**摘要:** 币缘是人们在货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久已存在,却长期被忽略的重要社会现象。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币缘成为国家之间围绕国际货币体系而产生的政治关系。全球性币缘是世界资本体系的产物,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金融全球化的当代,币缘已成为左右世界经济与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关键性因素。以币缘圈为核心的共同体建设,正在改变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的局面,为新型全球化开辟道路。

**关键词:** 货币体系;币缘政治;币缘圈

中图分类号:D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7)01-0001-15

币缘是以货币为媒介形成的社会关系,币缘政治则是这种社会关系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早期的币缘,主要是各文明共同体内部及周边地区的社会联系。在大航海之后,随着全球性贸易的出现,诞生了以白银为本位的世界货币,极大推进了资本的全球积累与扩张。在银本位制之后,相继出现过金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汇兑制、美元本位制等形态各异的全球货币体系,围绕这些体系形成了全球币缘,也由此形成了决定国际等级秩序的币缘政治关系。这是久已存在,却被人们所忽略的国际政治关系。

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下,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全球币缘,集中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利益关系,决定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现象,币缘

政治引起并推进了近代以来全球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化,对世界秩序的形成与运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金融资本左右全球秩序的当代,认识币缘政治的演化过程,了解其未来的可能发展,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具有重要的认识和实践意义。

## 一、白银资本: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

14世纪,奥斯曼帝国在西亚崛起,遮蔽了欧洲向东通往亚洲的贸易线路。依赖于贸易的热那亚城邦,被迫与利比亚半岛国家结合在一起,向西寻找通往亚洲的贸易新通道。在数百年的海外探险活动中,热那亚资本与伊比利亚王权的综合体发展出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新方

收稿日期:2016-11-20;修订日期:2016-12-23。

作者简介:王湘穗(1954—),男,广东广州人,退役空军大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军事和战略问题研究。

式——掠夺与贸易一体化的生产模式。<sup>①</sup>如同马克思所概括的那样,当时“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sup>②</sup>

1492年哥伦布航海到达了美洲。这对欧洲“掠夺-贸易”的资本积累模式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其中的原因,不在于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也不在于新殖民地的开拓,而在于欧洲人对美洲贵金属的无偿占有。据布罗代尔等人的推算,在1500年以前,欧洲历史上积累的全部货币财富折合白银总共约2万吨。但在1521—1600年期间,仅从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山就产出了1.8万吨白银,17世纪有3.1万吨,18世纪有5.2万吨白银流入了欧洲。在16—18世纪的300年间,共有10万吨以上的美洲白银成了欧洲新增的货币财富。<sup>③</sup>汹涌而至的美洲白银浪潮,使欧洲获得了“第一桶金”,在短时期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快速走上资本主义体系全面扩张的道路,也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传统格局。

拥有了巨量的美洲白银,曾经穷困的欧洲可以与经济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亚洲地区进行持续的贸易活动,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推动者和获利方。据统计,从1500到1800年,欧洲所能生产并出口的最主要的商品就是来自美洲的贵金属<sup>④</sup>。在三百年间,至少有6万吨白银流入了中国和印度<sup>⑤</sup>。在数百年世界贸易中,各国广泛使用白银进行贸易,白银成为世界普遍接受、且供应充足的贵金属,因而使白银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形成了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制度体系。就像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欧洲用其攫取的巨额增量白银为杠杆,逐步控制了世界的产业分工和贸易方式,逐步扭转了亚欧之间传统的经济地位,从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渐渐变成了中心。

来自美洲的贵金属洪流,不仅为羸弱的西班牙帝国输了血,让查理五世的军队有了更充

足的军费,同时也抬高了奥斯曼帝国的物价,使其稳定达数百年的货币出现大贬值,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并加剧了社会贫困,大量农民离开耕地流入城市或落草为寇,奥斯曼帝国的根基因而被撼动。货币财富的剧烈变化,演变为复杂的币缘政治效应,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在对付奥斯曼帝国扩张中取得了胜利<sup>⑥</sup>。快速膨胀的西班牙帝国的领地涵盖欧洲、非洲、美洲和亚洲,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sup>⑦</sup>。在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白银作为世界货币和国际资本的载体发挥了关键作用。

白银资本改变了原有力量的格局,也推动欧洲的财富中心离开了地中海地区。尼德兰地区曾经是哈布斯堡王国的一个省,通过为跨大西洋贸易提供服务,尼德兰联合省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欧洲的新兴之都。白银财富在布鲁日直到安特卫普的尼德兰狭长地带的城市群中,转化成了白银资本。安特卫普吸纳了大量的美洲白银,成为了欧洲的超级货币市场和保险交易所。它将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贸易连成一体,成了重要的国际中心市场,也使荷兰成为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得以不断成长的新空间。

经济发展带来了精神的解放和政治独立的诉求。在马丁·路德新教精神的鼓励下,荷兰人为了捍卫自身的权益与西班牙人打了80年的独立战争。在经历了30年的欧洲混战之后,欧洲开始摆脱天主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确立起更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权民族

① [意]杰奥瓦尼·阿瑞吉著:《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37页。

③ 张宇燕、高程著:《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页。

④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166页。

⑤ 同④,陈燕谷文章,第6页。

⑥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4、33页。

⑦ [英]杰弗里·帕克著,时殷弘、周桂银译:《腓力二世的大战略》,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前言,第5页。

国家体系。新型的主权国家产生于对王权、神权的斗争,其责任是为特定地区的资本增殖提供政治和安全的保障。因此,新型资产阶级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划清国家的空间界线,清晰的领土边界是区分不同民族国家产权和社会财富的依据,是保护国家内部私有财产的前提,也是对国家施行统一管理的基础。新国家废止贵族特权,对宗教更加宽容,树立并推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法人体制,采取减少暴力的内部绥靖政策,以“隐晦的经济压迫”使资本主义体系能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扩展。为此,国家需要全体公民是具有文化同质性的“观念共同体”<sup>①</sup>。尼德兰地区从联合省向主权独立的荷兰国家过渡历程,对欧洲传统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荷兰的独立运动唤醒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成了欧洲现代主权国家的“铺轨机”<sup>②</sup>,开启了重组现代欧洲政治版图的百年进程。在荷兰独立和欧洲主权国家体系建立的过程中,白银资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兴起的过程中,美洲白银无疑充当了第一推动。但令其持续下去并真正脱颖而出的动力,则来自白银的资本化以及白银资本对社会所产生的复杂效应。白银天然就是货币,可是作为货币的白银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就羽化为资本。货币要演变为资本,要形成保障这种演变持续下去的资本主义制度,养育出资本主义社会,还需要有宗教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制度的保障以及维护这一切的军事力量。荷兰银行家以低于西班牙王国数倍的利息为独立战争提供贷款,这是荷兰军队能够坚持战争并最终赢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美洲白银的到来,在欧洲濒大西洋地区培育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逐步发展起以商业、工业为主导经济形态的新文明——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海洋支配大陆的文明,形成了以大西洋为新中心的全球体系。整个世界的经济网络以白银体系为中介进行了重构,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新航线和新的洲际贸易网络取代了传统的亚欧大陆贸易网络。作为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体系新中心的代

价,世界其他地区逐步沉沦为边缘地带则是一个伴生过程。

在全球白银体系形成之前,中国的经济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先地位,中国农业生产效率要高于同时期的欧洲<sup>③</sup>。从明代开始,中国经济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自给自足的农耕模式,向存在大量市场交换的农工商混合经济模式转型<sup>④</sup>。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的铜钱体系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社会对货币的巨大需求,到16世纪40年代,白银已替代铜钱和钞,成为了中国货币的主币<sup>⑤</sup>。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无疑对全球的白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时世界产银的一半流向了欧洲。然而,中国社会缺乏把白银财富转化为白银资本的自觉意识,大量财富被投入军饷、皇室消费和官员俸禄,而基础性、建设性投资却微不足道<sup>⑥</sup>,因而无法完成从白银货币经济社会向白银资本社会的转变,而是止步于白银货币化<sup>⑦</sup>。

白银货币化推动了中华圈由兴转衰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东亚经济圈的解体。到明末清初,来自区域外的美洲白银长期大量流入,使东亚白银圈受到庞大增量货币的冲击,不断积累的新增货币在掀起了东亚地区商业狂潮的同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2-233、264页。

② [美]乔万尼·阿瑞吉等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5页。

③ 17世纪的欧洲,在农业生产率最高的荷兰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在东欧和北欧则有90%的人口从事农业。参见[美]龙多·卡梅伦等著,潘宁等译:《世界经济简史: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④ 据刘逖对1600-1840年中国经济结构的统计,农业产值占58%,制造业占15%,商业和运输业占27%。这已经是明显的混合经济体。参见刘逖著:《前近代中国经济总量研究(1600-1840)》,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50页。

⑤ 万明著:《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0页。

⑥ 皇室开支、官员俸禄、军费支出等国家消费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0%。国家的积累率只有3%左右。刘逖著:《前近代中国经济总量研究(1600-1840)》,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18页。

⑦ 所谓白银货币化是指,白银从贵金属成为货币;从非法货币变为合法货币;白银成为主币。万明著:《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6页。

时,还造成了对传统中华朝贡圈的离心力作用<sup>①</sup>。这种离心力渐渐超过中国货币和朝贡体系所能提供的向心力,使中国逐步丧失了区域经济的核心地位,也打破了中华朝贡圈相对封闭的经济内循环。这是中国在白银时代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清代,中国先后终止了从琉球、朝鲜、缅甸、日本和越南进口白银。从1775年起,中国开始完全依靠进口美洲白银<sup>②</sup>。这标志着中国的货币体系已经被纳入到全球白银体系之中,中国不再是区域货币体系的核心国家,其兴衰荣辱已不由自主。此时的朝贡圈各国之间的贸易,基本要依赖美洲的白银作为中介。这意味着,东亚经济圈被白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裹挟到全球体系之中,成为更加宏大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货币流通范围的改变,重塑了全球经济地理,中华朝贡圈至此便名存实亡了。作为第一个世界性本位货币,白银改变了全球币缘格局,将被其溶蚀的中华朝贡圈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

在1500年,欧洲人还不能生产让亚洲感兴趣的東西,他们为购买亚洲商品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就像约翰·罗伯茨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来自美洲的财富(主要是白银),就很难与亚洲建立贸易关系,因为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亚洲需求的任何东西”。因此,掠夺和侵占的美洲(及非洲)的金银就成为欧洲人的救命钱<sup>③</sup>。拥有美洲白银的欧洲,可以让中国提供茶叶和瓷器,让印度提供纺织品,让东南亚群岛提供香料,可以开辟并使用新的航路而不再依赖阿拉伯人把持的传统商道。白银使欧洲获得了调节亚洲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杠杆,使杠杆发生作用的支点则是欧洲占据优势的暴力。欧洲人通过暴力获得美洲的白银,再运用金银套利交易占有与亚洲贸易的超额利润,这是欧洲资本迅速积累的来源。在优势暴力、白银杠杆和套汇交易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世界经济中心转向了大西洋地区。

通过世界货币的白银体系,欧洲一步步从世界经济网络被支配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成

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历史证明,谁控制着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导权,谁就能主导世界体系的走向。货币是交换的载体,当白银成为全球主要交换工具的时候,它获得了塑造世界历史的力量。在白银体系——第一个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上,还诞生了一种新的世界权力关系——全球币缘。根据白银货币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世界几个大洲的等级序列被重新排序——非洲和美洲是被征服者,负责为这个体系提供奴隶劳动和贵金属;需要白银的亚洲则要根据欧洲的需求提供黄金和安排生产与贸易,因而从经济中心滑向边缘;由于传统贸易通道被新航路所替代,阿拉伯地区很快就失去了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的亚欧大陆的枢纽地位;握有白银货币流向杠杆的欧洲,不再是亚欧大陆主体板块的从属者,而是成了控制全球经济体系的白银资本之王。欧洲控制的美洲白银为世界规模的市场提供了所需的通货,它作为陡然增加的巨量货币,扭转了上千年传统亚欧贸易网络中的财富和权力的格局。欧洲人手中的白银财富变成撬动历史的资本杠杆,使他们逐步掌握了全球化进程的主导权。通过对交换工具——白银的控制,欧洲演变为世界的新中心。

## 二、金本位制与大英帝国

荷兰是英国的老师。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海外殖民地上先走一步的荷兰,是当时欧洲最富庶的国家,也是英国人心中艳羡的榜样。伊丽莎白女王几乎照搬了荷兰的商业和金融制度<sup>④</sup>,建立起了英国皇家交易所,发展起与安特卫普相似的商业票据、担保、现金保管、贴现、期货等

① [日]岸本美绪著,刘迪瑞译:《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② 林满红著,詹庆华等译:《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③ [英]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④ [英]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业务<sup>①</sup>。英国从荷兰学习到的最重要经验,就是如何通过国债与银行筹集战争费用的方法<sup>②</sup>。

在光荣革命前,英国的财政支出仅为180万镑。到8年之后的1697年,英国财政支出增加了4倍,而财政余额却有1670万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国债制度的成效<sup>③</sup>。靠着威廉和他的顾问们引入的荷兰公债制度——这是荷兰人曾经战胜西班牙的秘笈——英国以较低利息借到更多的钱,使经济和人口规模比法国更小的英国,能够在长期战争中逐步占据上风。到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和约》时,英国已经取得了对法国的最终优势,迫使法国只能面对漫长的衰退期<sup>④</sup>。

最好的学生,往往是老师的终结者。在历史上,终结荷兰霸权的恰恰是英国。英国对荷兰的学习,表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荷兰人最早建立海上运输网络,通过输送大宗商品形成了利润丰厚的海洋经济;与生存在大陆沿海地区的荷兰人相比,英国人似乎更懂得控制海洋的必要性,表现出对海权原则理解和实践的彻底性。为争抢荷兰人海上贸易利益,英国人于1651年起颁布了数个有关航运的法案,限定英国沿海贸易及殖民地贸易都必须使用英国船只,船员也必须是英国人<sup>⑤</sup>,甚至不惜发起对荷兰的战争。在1670年的时候,荷兰船队拥有的运输吨位超过除英国以外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而英国也只有荷兰的一半<sup>⑥</sup>。到1780年,英国船队的吨位就超过荷兰一倍。“海上马车夫”成为历史过客,而英国却成了海洋的新主人。

荷兰人教英国运用银行来发行国债,而英国人却最早认识到货币可以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工具。在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白银本位时,英国独树一帜,确立了金本位的货币体系。英国在与欧陆国家的博弈中认识到,货币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社会政治现象。保持货币的独立和稳定,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为此,英国财政部于1717年就颁发公告,确定了白银与黄金之间固定的比价关系。从而,把英镑与黄金联系在一起。在此后的100年里,英国成为一

个事实上的金本位国家。与采取银本位或复本位制的欧洲大陆国家不同,采取金本位制的英国受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遭受白银危机的冲击也较轻<sup>⑦</sup>,这使得英镑体系能够保持长时期的稳定,也使英国国债成为最稳定的长期收益来源。金本位制导致的英国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吸引欧洲大陆包括法国的巨额资金无论在平时和战时都流向了英国,这极大推进了英国产业的发展,支持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sup>⑧</sup>。

与金本位制联系的国债制度,为所有英国参与的战争,特别是反拿破仑战争进行了成功的融资。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拥有最后一个畿尼的人才能获得胜利,所比拼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支持战争的融资能力。采用金本位制,就意味着货币和国债的发行必须以金银储备为基础,只能接受最低限度的金融波动和通货膨胀<sup>⑨</sup>。在18世纪初,英国金银储备为1200万镑,流通纸币1500万镑,英国用金融技术多创造了25%的货币<sup>⑩</sup>。这在当时是令人垂涎的成果。英国靠着金本位制的锚一直保持着币值的稳定,为吸引国际资本和发行国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英国在1811—1815年间向英军汇款6500万英镑军费,给反法同盟的国家提供了5600万英镑的资金支持,给急需资金的惠灵顿将军每月汇款10万英镑的金块和金币,为攻打

① [英]M.M.波斯坦等主编,王春法主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307、320页。

② [美]威廉·H·麦尼尔著,倪大昕、杨润殿译:《竞逐富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③ [日]富田俊基著,彭曦等译:《国债的历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59页。

④ [美]沃勒斯坦著,庞卓恒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⑤ [美]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著,曾刚译:《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⑥ [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⑦ 同④,第357页。

⑧ 徐滨著:《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资本投资与社会机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序,第2页。

⑨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导言,第12页。

⑩ 宋则亢主编:《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马耳他的纳尔逊提供他所需的资金<sup>①</sup>。而无法发行国债的拿破仑,只能靠掠夺欧洲来获得战费,这疏远了归顺的民族和不甘心的盟友,从而使赢得了大多数战役的拿破仑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sup>②</sup>。

1821年,英国取得了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之后,英格兰银行开始正式推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是英国人选择的货币体系,欧陆国家却不能不接受。因为只要接受了英国的资金,货币体系外在的强制就会逐步内化为对资本的渴求,进而发展为对资本的服从。国际金本位制是欧洲19世纪文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制度<sup>③</sup>,英国所采取的金本位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欧洲资本及亚洲财富向英国的持续流入,使英国从欧洲的一个边缘性的国家,发展成为对欧陆具有主导权的国家。

人们容易看到,英国人如何用舰炮来维持其统治,却忽略了在更多的时候,英国通过适时牵动国际货币网络的细线来完成自己的统治<sup>④</sup>。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金本位制的货币杠杆。它利用资本的力量,扫除欧洲阻碍工业资本发展的政治和地理障碍,为蒸汽时代的工业资本在欧洲的发展创造了外部环境,也为工业资本在欧洲以外世界的扩张扫清道路。英国控制的国际资本,根据投资各国的风险和增殖可能的大小,来划分敌友和亲疏等级,形成了围绕英镑体系的币缘秩序。作为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币缘秩序虽隐秘却关键。

当然,要维持国际秩序,仅靠金融的力量远远不够。在维也纳体系的天鹅绒手套里,还有英国工业化军事力量的铁拳。对国家来说,谁能够获得资本的青睐,以更低的利息获取战争贷款,谁就可能在比拼谁钱更多的战争中占据上风。工业化的战争比倚靠人力畜力的战争更加依赖资本,在依赖资本的战争中往往是息差决定力量对比,甚至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谁控制着资本,谁就控制着战争胜利的权力杠杆。在战争工业化和国家经济向工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资金流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命脉,谁控制着国际资本的流动,谁就控制着他国的命运。

19世纪的英国,既是欧洲的钱袋子,也是欧洲的兵工厂<sup>⑤</sup>。没有英国资本的支持,欧洲各国难以进行持久的战争;没有英国工业制成品,欧洲国家亦无法在工业化的战争较量中占据上风。当英国需要维持欧洲和平以保护资本增殖的时候,依赖于英国资金的列强也只能跟随英国去维护和平。英国通过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控制着进行战争或是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资本。英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欧洲资本的流向,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欧洲。而均势体系,是英国控制欧洲的另一工具。

欧洲的均势体系,产生于资本积累的需求。英国之所以愿意维持欧洲的均势,是因为英国工业资本发展需要欧洲的市场与和平的环境。而英国能够具有这么做力量,很大程度来源于金本位制和英国工业化的军队——这两者是英国手里的世界权杖。从表面上看,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均势缔造并维持了欧洲和平,但若深入世界权力结构的内部,就会发现国际金融体系缔造了均势。英国资本用流向与流速控制着力量的均势,保证欧洲中心区在均势下的和平中实现积累,和平遵从着资本的逻辑<sup>⑥</sup>。

按照英国均势原则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它是反拿破仑战争后作出的政治安排。在一场由英国资助并获胜的战争后,欧洲无法摆脱英国的影响,也无法离开英国的继续支持。因此,维也纳体系是建立在英国货币体系之上的国际政治秩序,体现了英国资本对欧洲大陆政治的支配地位。金德尔伯格指出,所谓金本位制不过是由英格兰银行以自己为中心控制和操纵的英镑本位制。当时的英格兰银行能够通过掌握和操纵贴现技术来管理金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

① [日]福田俊基著,彭曦等译:《国债的历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142、145页。

② [美]杰弗里·帕克著,傅景川等译:《剑桥战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4页。

③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④ 同③,第12页。

⑤ [美]威廉·H·麦尼尔著,倪大昕、杨润殷译:《角逐富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⑥ 同③,导言,第13页。

制定世界利率水平,不在于英国的黄金存量,而取决于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拥有超出其他国家的能力及权力<sup>①</sup>。英国通过金本位制的货币杠杆,利用资本的力量,扫除了欧洲阻碍工业资本发展的政治和地理障碍,为蒸汽时代的工业资本在欧洲的发展创造了外部环境,也为工业资本在欧洲以外世界的扩张扫清道路。

英国金本位和工业化的军事力量重塑了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了均势欧洲与失衡世界相对立的二元结构,形成了中心区和平与边缘地带战乱的局面。均势欧洲是保证资本增殖的核心区稳定的需要,而拓展世界市场边界的对外扩张,则是为了打造足以支持中心区经济起飞的广大边缘地带。因此,边缘地带的战争,成了保障中心区和平的条件。与欧洲的百年和平对应,欧洲在英国引领下对全球进行了百年扩张。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百年里,欧洲各国对外部发起过至少58场战争<sup>②</sup>。在这些战争中,欧洲人无一例外地获得了胜利。从拿破仑战争开始,上帝就一直站在拥有较强工业基础的国家这边,也就是站在工业资本的这边<sup>③</sup>。富裕欧洲依靠资本和军事的优势,从欧洲区域外获得了更多的利益<sup>④</sup>。从1840年起,在进入工业化的阶段战争中,欧洲只要用一点军事力量就足以让中国、日本和非洲国家打开贸易大门<sup>⑤</sup>。

从币缘政治的角度看,金本位是英国版世界秩序的核心,是大英帝国的隐秘权杖。它与英国军事力量、工业基础、外交技巧相互支撑、巧妙配合,主导着英国周期世界体系的走向。

英国的成功,引起各国竞相效仿。对金本位制信任,成为那个时代的信念<sup>⑥</sup>。与信念同样重要的是,南非黄金的大量涌出,使世界黄金产量在1830年到1853年间增长了三倍多,从181.96万两上升到635万两<sup>⑦</sup>。德国在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后,将国家货币体系的复本位改为金本位制<sup>⑧</sup>。从此,欧洲各国纷纷效法,相继选择了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在明治维新后苦于没有黄金储备无法实行金本位制的日本,在获得了甲午战争赔款后,也立即推行金本位制。

国际金融领域的多体效应造成了历史的湍

流,搅乱了英国人普及金本位制的预期,金本位制的扩散没有完成创造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目标,也没能削弱民族单元和国家政府的作用,反而产生了加强国家的功效<sup>⑨</sup>。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强权,在模仿金本位制和工业化后再度兴起,成为英国全球霸权的挑战者。德国海外贸易的巨大扩张和商业舰队的渐次扩大,极大威胁到英国的经济,使其出现崩溃的可能性。德国经济全面超越的前景而不是德国海军威胁,推动了1903年“英法协约”的签署,并最终导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sup>⑩</sup>。

到达产业巅峰的英国,渐渐踏入了“金融秋天”。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英国经济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发出了英国主导的体系周期进入危机季节的信号。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这标志世界金融中心转移的开始。美国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也在极力学习英国式的工业化和金融体系以改变自己的边缘命运。

随着美国的兴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帝国的金本位制及其控制的海权与均势体系一道露出了颓势。

① [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徐子健等译:《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79-81页。

② [英]桑德拉·哈尔珀琳著,唐皇凤、武小凯译:《现代欧洲的战乱与社会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③ [美]杰弗里·帕克著,傅景川等译:《剑桥战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

④ [意]乔万尼·阿里吉著,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⑤ [美]威廉·H·麦尼尔著,倪大昕、杨润殷译:《角逐富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页。

⑥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1页。

⑦ [英]富勒著,钮先钟译:《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8页,注释2。

⑧ 同①,第77页。

⑨ 同⑥,导言,第21页。

⑩ 同⑦,第149-154页。

### 三、金汇兑制与美元本位制

在欧洲主导的全球等级序列中,北美殖民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独立后的美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发展,才站到了资本主义中心的门槛边上。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中心的均势体系,使英国治下的和平难以为继。在德国崛起的压力下,英法被迫引入域外的美国来恢复秩序,这意味着延续了四百年的“欧洲中心”世界体系,开始转向“跨大西洋中心”的时代,就此揭开了美国世纪的帷幕。

美国周期与荷兰、英国周期一样,都起源于实业特别是制造业大发展。只是造船业是荷兰、纺织业是英国产业链的源头,而在美国,则是铁路的兴起。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是美国经济和国家面貌变化的新开端。在几十年时间里,共有5条横贯大陆、总长超过10万公里的铁路建成。美国铁路建设不仅提供了新的高效的运输体系,也提供了新的企业组织方式。整个美国经济被铁路网联系在一起,这种快速、定期、全天候的新运输体系使美国可以进行全国性的社会化大生产。美国铁路修建等基础设施建设还培育了美国式的金融市场。修铁路、通运河、建电网需要大笔资金,促使专业化投资银行公司在美国出现,这导致了金融市场在华尔街的集中和机构化。1880年,美国纽约交易所一共有103只股票,其中有73只是铁路公司股票,占全部股票的70%;1890年,纽交所的交易股票为118只,铁路公司为90家,占到了全部股票的76%<sup>①</sup>。铁路的发展也推动美国进入城市化,从1860年至190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19.8%上升到39.6%,城市数量也从67个增长到318个,在全国构成了大中小各类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的工业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头羊。1897年美国变成了资本净输出国,成为国际上的主要债权国之一,同时也成了国际贸易的净顺差国<sup>②</sup>。到20世纪初,美国

的经济规模超过英、法、德三国之和<sup>③</sup>。美国的崛起,改变了大西洋两岸的力量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美欧力量对比的分水岭,关键标志就在于欧洲欠下了美国的巨额债务。“一战”之后,欧洲国家欠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了120亿美元,美国从欧洲的长期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美国与欧洲的权力关系,就此发生逆转。债权债务本就是基于货币的社会关系,国家债务不仅左右着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还具有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能力。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说,借贷是资本增殖的一种主要方式。美国资本把介入欧洲战争,当做实现增殖目标的一种投资。因此收回战争债务,是美国的基本利益所在。作为欧洲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美国由于握有债权,因而试图凌驾于欧洲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上,把债权变成支配权。美国人已经明白,战债不仅是改变国际货币权力的杠杆,也是撬动原有国际政治格局的杠杆。债权要转变为权力,需要债主有施加压力的手段。欧美国间债权债务的博弈,开始超出经济范畴,成为国际政治权力的角逐。

早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国的政治精英就对“美国在当前的战争和将来的世界秩序中的利益”进行过深入探讨。他们形成的共识是,美国将向战后的世界贡献美元,使世界能够向美国购买产品以实现美国的充分就业<sup>④</sup>。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参战前,就委托跨政府部门的重建委员会,设计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sup>⑤</sup>。美国的设计,包括组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

① [美]乔纳森·休斯,路易斯·凯恩著,邸晓燕、邢露等译:《美国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3页。

② 同①,第431-433页。

③ [美]斯坦利·L·恩格elman等主编,王珏等主译:《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274、277-278页。

④ [美]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27页。

⑤ 欧洲战争爆发二周后,国务卿赫尔在国务院建立了“和平与重建问题委员会”。美国财政部、副总统华莱士也组建了类似班子。后按罗斯福要求,重组了“战后对外政策顾问委员会”。张振江著:《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154页。



税与贸易总协定、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等组织,也包括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sup>①</sup>。根据这些设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国家公园签署了有关协议。协议的核心,是在美元取代英镑在全球贸易、金融和储备货币地位的基础上,构建起美国主导世界的秩序<sup>②</sup>。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美国登上世界权力巅峰的标志。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秩序,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实力的体现,也是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一体系有一整套体制机制的设计,包括推出国际货币的“平价”机制,即以黄金和能够转换为黄金的一种货币来确定各成员国货币的汇价<sup>③</sup>。虽然在文件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一货币就是美元,但由于美国控制着世界上近80%的官方黄金储备,因而只有美元能够承担兑换黄金的功能,这就形成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国际货币安排<sup>④</sup>。与各国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的传统金本位制的不同在于,这一双挂机制使一国货币——即美元充当了其他国家货币与黄金转换的中介,这就使美元成为了与黄金一样的硬通货,让原本只是一国货币的美元成为了各国接受的国际核心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以美元和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等级秩序,美国和美元高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二战”之后不久,美国在亚洲陷入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战争需要大量的融资,需要美国政府能够大量借债、甚至是透支来支撑战争。加之美苏冷战的“和平竞赛”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约翰逊“大炮加黄油”的政策更是极大地增加了财政赤字。受到实物黄金制约的金汇兑制,难以满足为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的融资需求。迫于战争压力和基于美国利益的设计,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停止承担对外兑换黄金的义务<sup>⑤</sup>,单方面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汇兑制的

终结。

在摆脱了金汇兑制约之后,美元不再是要保证与黄金兑换的“美金”,而是靠美国国家信用支撑发行的纸币。这无疑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以往各国发行的纸币,虽有国家信用担保,但其总要与金银铜等实物挂钩。美元成为人类社会第一个纯粹的主权信用国际货币。由于美元是世界主要货币,而美元只靠美国的国家信用作为担保,这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在美国一国的信用之上。由此,美元就从混合本位的金汇兑制,转变成了纯粹由美国国家信用担保的纸币,成为“美元本位制”。

这一货币史上的重大转变,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往国际货币体系的属性产生于货币的基本功能,主要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收支调节和资产储备。美元本位制给美国提供了可以无限创造货币的权力和能力,使之获得了一种最便捷有效的信用扩张工具。发行美国国债成了美元体系信用扩张的主要方式,成为美元体系巨大收益的来源。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原本属于债权国的主导权力就这样悄悄转移到了最大债务国的手里。

产业空心化,是经济金融化的副产品。美元体系的性质变化,推动美国经济体系脱实向虚。美国的资本家们发现,再从事实业生产就变得既肮脏又愚蠢,即使是通过向实业投资获

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解决黄金短缺的问题,英国人提出了实行“金汇兑制”的方案,因不符合美国利益而无法实行。金汇兑制的关键在于,以哪个国家的货币为挂钩货币。参见[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徐子健等译:《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页。

② [美]本·斯泰尔著,符荆捷、陈盈译:《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③ 美国对“二战”后制度框架设计的最早机构是洛克菲洛基金会的和平与政治研究组。

④ [美]保罗·沃克尔、[日]行天丰雄著,贺坤、贺斌译:《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⑤ [美]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311页。

取利润,也成为吃力不讨好的事。于是,美国资本不再以从事实业生产为获取利益的基本途径,而是趋向于直接的以钱生钱。美国经济开始了一个被称为“去工业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美国公司对制造业的再投入减少,而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大幅增加,美国公司的收入和利润越来越依赖金融。到1980年,美国公司总利润中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份额就赶上了制造业的份额<sup>①</sup>。即使是像通用公司这样的著名制造业企业,其收益也越来越多地依赖通用公司的金融部门来实现。在产业资本集团主导美国的时代,“通用就是美国”<sup>②</sup>;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华尔街才代表美国。华尔街政治通过提供资金来控制、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进而控制整个社会<sup>③</sup>。

对于身处越战泥淖和与苏东集团冷战的美国来说,金融化带来的收益实在是雪中送炭。美国从此可以用“美元货币-资本体系”来获取收益,就像用“芝麻开门”的密语就能打开财富大门,而不必像苏联那样必须以出口石油或其他资源和产品才能获得有限的“硬通货”。放弃金本位这一原本被逼无奈的举措,却收到了“破坏性创造”的效果,也在不经意间奠定了美国赢得冷战的最终结局。这或许是美国在金融之秋的诸多收获中,分量最重的果实。只是秋天之后,就是冬天。

#### 四、金融化时代的币缘政治

金融化是一种社会财富的积累方式,意味社会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生产和贸易的方式获得。经济金融化曾经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周期性现象,在每一个百年发展周期中,都会有一个本周期的“金融秋天”。与以往受到实物货币和主权信用体系限制的经济金融化不同,如今的金融全球化,是一种以金融渠道获取财富,按金融需求和理念塑造社会并以金融权力治理世界的模式。

金融化意味金融资本主导经济,进而成为支配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力量。作为资金的

融通活动,金融产生于货币;作为追求增殖的资金融通,金融本质上是货币的资本化运动。在产业经济占主导的时代,金融资本需要通过实业才能实现盈利,因而是产业资本的从属。而经济金融化的过程,是金融资本摆脱产业资本成为经济和社会主导的过程。金融化的最初阶段,是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洗劫<sup>④</sup>,进而是通过金融资本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实现对社会的洗劫,而最终则是依赖国家霸权完成对全球的洗劫。从全球的视角看,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变化,是超出一国界限的全球性政治经济趋势。金融化从一国的金融资本逐渐主导经济起步,进而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连接,开始左右国际政治关系、直至重构全球社会。这一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世界进入了金融化时代。

在金融化的进程中,主权信用的式微和超主权信用的扩张,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组现象。在主权国家时代,货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无论是缺少硬通货导致的通缩,还是超发货币引起通胀,或是由此引发经济衰退或社会动荡,基本是所在国自己的事。金融全球化进程改变了这一状况,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导致了大规模的国际货币流动,一国货币的过快增长将影响其他国家,这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国际现象<sup>⑤</sup>。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带头采取量化宽松(QE)政策,导致出现全球性流动过剩;当美联储加息后,又导致全球面临通货紧缩;而欧元、日元采取的零利率政策又在对冲美国的货币政策。全球关键货币间收放博弈,带来全球流动

① [意]乔瓦尼·阿里吉著,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137页。

② [美]斯坦利·L·恩格勒曼等主编,王珏等主译:《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英]彼德·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④ [美]迈克尔·赫德森著,曹浩瀚译:“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下)”,《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第44页。

⑤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安佳译:《货币的祸害》,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5页。

性的数量和流向的巨大改变,使其成为影响和干预他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杠杆。

金融资本获得对世界的控制权,是金融全球化的政治本质。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越来越显著地受到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金融机构的支配。在抵御本国金融危机或是在合作对抗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人们看到许多国家政府的救助政策更有利于保护金融资本;而在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冲突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金融资本的利益。除了跨国金融机构之外,国际金融资本通过经济金融化、政治和社会的金融化,完成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与改造,使其成为了“金融型国家”——即金融资本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是空有国家之形却只能按金融资本需求行事的“国格化金融资本”。这些金融型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来推动全球金融化,通过全球金融化获取体系性收益,却也因全球金融资本的赢利需求不断陷入国家的生存危机。

随着世界经济的金融化趋势,金融化已经在影响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形态与实质,开始改变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国家利益的金融化,是指国家利益被金融所渗透并逐步主导,金融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主要内涵的过程。国家利益是一个包括物质和精神等多种要素的综合性框架,金融化对构成国家利益的生存、独立、财富和荣誉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家间的金融对抗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在与跨国公司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的金融博弈中,国家也可能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这种被颠覆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将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国家财富、还是个人财产,都受到重大损失,社会也将陷入持久的动荡。金融工具可以重新分配全球的财富,使国家得到或损失重大利益。占据世界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国家和经济体,或是控制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国家,可以利用主权信用发行货币,或通过超主权信用提供大量金融衍生产品,通过操控汇率、大宗商品价格等多种手法,实现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侵占。利用金融工具赢利的现代国家与传统重商主义

国家不同,它们更多地依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而不是靠枪炮和贸易获得财富。不论是金融危机时受援国家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渡的部分国家主权,还是平时各国央行必须跟随美联储调整自身政策,都说明关键货币国家对其他国家主权具有不使用暴力也同样拥有的控制力。

除了国家利益金融化的趋势外,金融化对国家力量的重要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据摩根索的看法,国家力量与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政府素质这些因素相关<sup>①</sup>。这些国家权力因素在金融化趋势下或多或少都发生着变化。在金融化时代,权力政治的运行模式是金融资本控制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市场控制经济活动与政治生活,由此获取新的财富并强化这一控制过程。金融权力是国家力量的倍增器,获得与运用金融权力,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

在全球金融化时代,金融活动已经溢出了经济领域和国家范畴,正在获得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的系统性权力<sup>②</sup>,而这一权力又将再转化为对边缘地带国家财富的体系性占有。正因此,囿于主权国家的产业资本与全球流动的金融资本、跨国资本与国格化资本、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传统资本和承担部分社会责任的新型资本之间,爆发了占有与反对占有的矛盾,并在世界范围爆发了日趋激烈的冲突。这种不同资本之间、资本与国家之间、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与博弈构成当代币缘政治的基本形态,并成为时代的鲜明标志。

金融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形态,导致在今天世界政治大棋局的博弈中,币缘政治将与地缘政治一道成为合纵连横、纵横捭阖的关键性因素。如果说,血缘是农耕与游牧时代社会关系的核心,地缘是工业时代国家关系的本质,那么币缘在当代就是左右世界经

①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② [美]让玛·瓦苏德万著,贺钦译:“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第1页。

济与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核心要素。在如今世界上,币缘虽然不是一切,却是理解和把握一切的关键。

## 五、币缘圈:基于区域货币的 洲域共同体

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存在着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单一向复杂的发展规律。对于社会治理,也存在从血缘氏族、部落、城镇直至民族国家等组织方式的变迁。目前的全球治理,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治理模式,其内在逻辑是资本的无限积累。资本积累的逻辑摧毁了传统的封建领地,建立了不同于血缘和地缘的新的信任体系,并构建了主权民族国家这一人类社会的最大、最有效能的单元。由血缘社会走向地缘社会,是人类社会不断扩展,走向复杂化的里程碑<sup>①</sup>。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人们开始从夹杂着血缘的地缘社会走向资本主导的币缘社会。资本的逻辑支配着人际关系、经济运行、市场规则、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中,存在着文明的进化,也糅杂着野蛮的基因。在资本的驱使下,不同行为体主动或被迫选择排他性最大化的生存策略、社会政策和国际战略。如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这导致了“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普遍现实,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治理中无法解决的矛盾。

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以来,只有极少数国家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大部分国家只能在欠发达发展水平的边缘地带挣扎。正如阿米尔·阿明指出的那样,其他国家的欠发达,恰恰是发达国家能够发达并保持发达的条件<sup>②</sup>。任何一个单一主权国家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不具有真正的经济独立性,都难以摆脱“依附型发展”的历史宿命。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实践经验看,要改变资本体系为刀俎、民族国家为鱼肉的命运,只有通过超国家的合作,尚可能夺取一线生机。

在一国之内难以建成现代化社会、以一国之力无法抵御来自中心国家集团的打压,这是身处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历史实践的总结。即便是欧洲的发达国家,要保持自身在全球社会的平等地位,也需要构建超国家共同体。

曾经由资本构建的主权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最大单元。如今它既无法适应资本全球增殖的需要,也难以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需求。超越国家共同体的出现,既是对生产能力和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的适应,也是对全球治理中资本逻辑的遏制。扩大共同体从来是人们减少领地式争夺的有效策略,作为社会性生物,合作是人类个体和种群延续的一种本能,通过扩大人类共同体单元的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恶性竞争和彼此间的战争,还可以形成更大的规模效应。全球生产和全球贸易能够带来更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已经被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所证实。由于全球化政治架构的缺失,国家自然各逐其利,全球只能处于无政府状态。要改变人类社会的这一困境,需要突破国家是最大合作单元的传统框架,开展国家间的合作,以合作增进利益,培养相互信任,在形成彼此间认同的基础上,缔结成新的、更大的区域共同体。

在维系人类共同体和建立秩序的历程中,货币从来都充当着重要的工具,而币缘则是强化认同和增进合作的纽带。缺少币缘联系的共同体,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都十分地脆弱。正因此,建构超国家的币缘圈,成为人们的一种新选择。

“币缘圈”是指若干国家以统一货币为纽带形成密切合作关系的空间区域。在实物货币时代,金银等贵金属充当着国际货币,货币联系主要体现在贸易领域,当时的货币区实质上就是贸易区。随着贵金属逐步被剔除于货币体系的进程,国际货币渐渐演变为信用货币。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选择什么货币作为自己的贸易结算

① 郑也夫著:《信任论》,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② [埃及]阿明著,杨明柱等译:《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的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工具和储备货币,除了有经济和政治包括安全上的考虑外,主要是基于对这一货币的信用判断。采用哪种货币,就代表着更相信谁的信用,也意味与谁保持更紧密的经济与政治联系。

处于全球资本体系中依附性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要想改变不平等的权力秩序,就需要与发展程度和规模相当的国家结成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获得与发达国家相对均衡的力量,争取平等地位。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才有可能掌控生产与交换的主导权。对实体经济国家来说,组成币缘圈是制衡全球金融霸权的有效手段。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通过合作建立超国家的币缘圈,可以使国家在面对洲际性霸权国家和全球金融霸权体系时不再势单力孤,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收益。这既是趋利避害的选择,也是促进国家发展上台阶的战略举措。

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币缘的中介作用,通约利益和交换价值,化解矛盾和冲突,建立起休戚与共的机制与制度性联系,创造持续互动的基础条件,在无数交换利益的实践中培养和巩固认同感,逐步走向超越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可以说,构建洲域共同体和币缘圈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自主政治意愿的经济活动,也是在经济合作中推进彼此政治认同的进程。

相对于开放的全球体系,币缘圈是相对封闭并能长期运行的经济体,这意味它们是一个比较完整、具有一定的内敛性、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也是可以谋求与外部世界平等地位的开放经济体。以现代经济体系的框架衡量,币缘圈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结构,它拥有能够满足发展需求的资源体系、相对完整的制造体系和能够提供有效流动性的货币金融体系。除了这一基本的“三元结构”外,币缘圈还需要通过多国间的政治合作,建立解决内部矛盾的机制和集体安全框架,要通过密切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彼此认同,走向区域共同体。组成洲域共同体的目的,就是各国通过合作,扬长避短,形成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优势,实现自身稳定发展和提高全球竞争力。

与主要着眼于经济和货币功能的最佳货币区不同,币缘圈是主权国家组织起来应对全球金融资本扩张的产物,具有浓烈的国际政治色彩。它能够包容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求一国经济内部的完整性,注意成员国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强调彼此认同,突出协调与合作。洲域国家的合作组织要达到币缘圈的程度,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进程需要区域国家之间在贸易、产业、政治、文化、安全等多领域的合作,通过大量合作实践培养认同感,再经过充分商议和试验,建立起区域货币体系,以此进一步加强合作与整合,逐步形成洲域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sup>①</sup>。

与单一国家比较,币缘圈具有显著的规模效益,更多的空间和人口意味更大的统一市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可以支撑教育科研体系的发展、可以加快基础建设和投资的回收;统一的安全框架不仅可以有效抵御金融型国家的军事压力,还可减少安全开支,消除区域间国家的内部矛盾;人口可以更多更便捷的流动,促进、服务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扩大的规模降低了社会发展的边际成本,带来了区域国家共同的综合性社会收益。总之,币缘圈是在统一货币体系内,获取各种资源、各种制成品和包括安全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的发展空间,是可以与其他主体实现互惠式交换的超国家主体。

从初步形成和正在成型的洲域共同体的经济结构看,它至少要拥有足以支撑自身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市场、拥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拥有能够配置经济资源的金融服务业。为了保证经济活动和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它还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和培养后备劳动力的教育体系,有完整的科研体系,还需要有能够保障发展所需安全环境的军事力量。当然,也少不了有相互包容的文化、能够化解矛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与以往主权国家体系中的国家相比,以币缘圈为核心的洲域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特

<sup>①</sup> 习近平主席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方向。

征——“单个国家不再独自行动,而是在地缘上形成紧密联系的共同市场,这个共同市场以经济互补性能够保持该地区在粮食、武器和重工业等关键必需品上自给自足为特征。”这些不同于传统主权国家的行为体的出现,已经在冲击似乎普世的自由放任、无政府或均势体系的世界秩序,并开始构建区域内广泛合作、相对自给自足和政府加强管理的世界秩序<sup>①</sup>。

长期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体。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以币缘圈为基础的洲域共同体将成为世界新体系的主体单元。未来世界的可能前景是,主权国家将继续存在,却不是世界体系的主角,至少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唯一主角了,超国家的欧共体、泛亚共同体、美洲共同体及相应的币缘圈将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板块。无论在地理空间还是在经济上体量都更大的洲域共同体,拥有更强的综合能力包括核力量,会极大提高彼此使用暴力的代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以军事力量进行经济剥夺的冲动。这与超国家间的合作示范和币缘的中介作用一道,使洲域共同体成为推动新一轮更公正全球化的新主体。

“洲域共同体”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新体系的主体,历来在世界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将让位于“洲际政治”;以往国家间围绕地缘政治的竞争,也将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全球与区域的币缘政治博弈。因为,在推动金融全球化时代变化的诸多因素之中,当代币缘是隐在深处却至为重要的因素。

币缘圈是未来全球秩序的生长点,是从国家共同体经过区域共同体,向人类共同体过渡的重要阶段。未来的全球体系,既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裂变,也产生于洲域国家共同体的聚合。在未来,大国注意力将不是致力于全球地位的角逐,而是关注与区域国家的合作。促进洲域共同体的形成,是大国的新责任;能否成为洲域共同体的核心,是衡量大国的新尺度。

洲域化的多样性世界,可以通过币缘的中介求得内在统一性,以形成全球共生性经济,进而发展起多元共生的体系<sup>②</sup>,这是解决全球问题

的正确思路,也是由洲域共同体过渡到新全球化的途径。说到底,币缘圈是国家间合作优先战略与策略的固化,它是对非合作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叛与进化,也为形成合作大于对抗的世界创造条件。从全球历史的视角观察,币缘圈共同体既是全球体系的收敛,又是国家体系的扩展;是能量聚积的过程,也是肌体生发的姿态,它可让陷入全面危机的世界旧体系有序地解体,为随之到来的全球新秩序做好铺垫。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全球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进程中,其主要内涵不是指地缘意义上的世界重组,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哲学思想的升华。所有向着多样化、多元化的所有努力,都将涓涓细流般汇聚,推动单向度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趋势发生逆转。未来的世界体系,将是包容多元文明和多样化发展的体系。霸权国家主导下的秩序,将被洲域间合作所建立的新规则和新权威所替代。

世界秩序的新基础,是超越了国家主权体系的洲域化共同体——其核心是通过利益交换形成持续合作的币缘圈。嬗变后的全球体系将以世界多样性的面貌回归——这是具有空间交错、结构差异、利益混合、多元共生等特征的全球社会。在新的生产力水平和更高社会组织层次上,有可能形成一个多元文明并存、多样化发展、多模式合作的全球新体系。

编辑 邓文科

<sup>①</sup> [美]迈克尔·赫德森著,杨成果、林小芳等译:《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导论,第3页。

<sup>②</sup> [美]黑尔佳·策普-拉鲁什、威廉·琼斯主编:《从丝绸之路到世界大陆桥》,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 The Evolution of Currency-politics

WANG Xiangsui<sup>1</sup>

(1.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Currency-rim, a longstanding while persistently neglected social phenomenon, is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resulted from exchange of currency. With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currency-rim has emerged as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nations, focu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worldwide currency-rim, having developed through different phases, is the product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Currency-rim has been the key factor that leverages globe politics and economy, even influences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around the currency-rim circle is actually transforming the situation that a single power dominates the world order, which paves the way to the evolution of new-typ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monetary system; currency-politics; currency-rim circle